

山东省社会科学规划研究项目文丛·青年项目
山东交通学院科研基金资助项目 (R201309)

中苏关系中的美国因素

(1949—1989)

胡晓丽◎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山东省社会科学规划研究项目文丛·青年项目

山东交通学院科研基金资助项目 (R201309)

中苏关系中的美国因素

(1949—1989)

胡晓丽◎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苏关系中的美国因素: 1949 ~ 1989 / 胡晓丽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5. 5

ISBN 978 - 7 - 5161 - 5992 - 7

I. ①中… II. ①胡… III. ①中苏关系—国际关系史—研究—1949 ~ 1989
②中美关系—国际关系史—研究—1949 ~ 1989③美俄关系—国际关系史—
研究—1949 ~ 1989 IV. ①D829. 512②D829. 712③D851. 29④D871. 2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081340 号

出 版 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刘志兵
责任校对 芦 苇
责任印制 李寡寡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发 行 部 010 - 84083685
门 市 部 010 - 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刷装订 北京金瀑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版 次 2015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5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80 × 1230 1/32
印 张 6.5
插 页 2
字 数 161 千字
定 价 28.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电话: 010 - 84083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 录

绪论	(1)
第一章 美国对中苏外交政策的历史文化渊源	(11)
第一节 政治文化传统	(12)
第二节 反共主义历史背景	(25)
第三节 美国冷战政策的形成与战后初期 中苏关系的演变	(35)
第二章 中苏结盟友好时期的美国因素(1949—1958)	(43)
第一节 “楔子战略”的出台与中苏结盟友好	(43)
第二节 “楔子战略”的第一次调整	(59)
第三节 美国“高压”政策影响下的中苏 “蜜月”友好	(80)
第四节 中苏友好的大背景下潜伏的危机	(91)
第三章 中苏关系破裂过程中的美国 因素(1959—1978)	(99)
第一节 “楔子战略”的第二次调整	(99)
第二节 中苏两党分歧	(105)

第三节	中苏关系分歧争论过程中的美国因素	(113)
第四节	中苏关系走向完全破裂过程中的美国因素 ...	(124)
第四章	中苏关系正常化进程中的美国 因素(1979—1989)	(160)
第一节	卡特政府末期的对华对苏政策趋势	(160)
第二节	里根政府的中苏政策	(163)
第三节	中苏关系酝酿正常化	(168)
第五章	结语	(174)
参考文献		(183)
后记		(203)

绪 论

一 国内外研究现状述评

国内对冷战时期中苏关系史以及对美国对华对苏外交战略的研究，自 20 世纪 90 年代苏东剧变之后成为学术界和理论界的一个热点问题。特别是进入 21 世纪中国迅速崛起，不少有关专家和学者发表了许多有分量的论文，如沈志华（2007）、李丹慧（2006）、牛军（2003）、张盛发（2002）等从不同角度和层面上进行了有益的探讨。具体来说，国内学术界主要研究了下列几个问题：（1）关于美苏冷战及对中国的影响。目前国内学者大都认识到美苏冷战对中国的内政外交都产生了重要影响，甚至改变了某些对内对外政策。（2）关于中苏关系史。从新中国成立到苏联解体，中苏关系大起大落，经历了从结盟友好到关系破裂再到关系正常化的演变。中国学者对中苏关系史的经验特别是教训进行了深入述评。（3）关于中美关系史。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迅速崛起为世界首强，中美两国综合实力、意识形态和国家利益的差异影响着两国关系。美国对华外交中充满冷战思维，同时也兼顾国家利益，只是鱼和熊掌往往难以兼得。中美关系明显受到美国反苏反共意识形态的影响。（4）关于美国因素与中苏关系史。就中苏关系而言，除中苏双方自身的内部决策与运作之外，最不能回避的一个外部因素就是美国的影响。中苏两国

1950年同盟关系的确立,20世纪60—70年代关系的恶化和武力对峙,80年代末的关系正常化,都与美国有密切联系。

冷战时期的中美苏关系史,尤其是美国的外交史,一直是西方外交史学界关注的问题之一。这种关注从冷战时期一直持续到今天,形成了较深入的研究。他们对冷战时期中美苏关系的研究特点有以下几个方面:(1)从研究内容看,主要集中在美苏冷战史、中苏关系史、中美关系史和中美苏关系史研究上,各国学者出于诸种原因分别关注某两国外交关系,有的研究也涉及其他国家。(2)从研究方法看,分阶段研究较多,截取其中几年至十年的研究较多,冷战史研究显然难以大题小做。(3)从研究重点看,美国和苏联这两个冷战的主角是研究焦点,在纷繁复杂的冷战史研究中,最不能回避的研究对象是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之间的持续对抗。(4)从研究目的看,西方的研究带有浓厚的国家利益色彩,有的学者明显反共、反华或反苏,对事件的描述和评判突出负面效应,有失客观。

综上所述,国内外学术界对1949—1989年美国与中苏关系的演变问题进行了初步的研究,就冷战史或中美苏三国中的双边关系进行研究者居多,对中苏关系的研究显得薄弱,对美国因素与中苏关系的演变等涉猎较少,为数不多的研究不够深入,美国因素与中苏关系的演变研究的系统性、全面性亟待加强。因此,中国学者目前面临的任务是在冷战史研究领域,进行美国与中苏关系的演变研究,注重冷战史、美国外交史、中美关系史、中苏关系史等的相互交叉与互动,结合中国国情,尤其是针对新中国成立40年来外交战略的演变,构建一个基于中国视角的中美苏关系史理论。本课题研究将加入这项历史性的任务中。

二 研究价值、研究思路和创新之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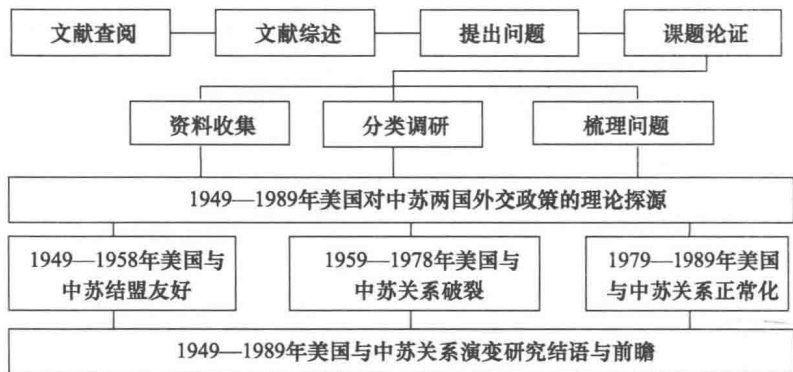
美国和俄罗斯在 21 世纪的中国外交中仍担任重要角色。2012 年 11 月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坚定不移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外交上，与美、俄等国的关系仍然是党和国家关注的重点，表明了党和政府推动中国崛起为全球强国的强烈意愿。在这种形势下，迫切需要学术界对冷战时期中美苏关系史进行全面、系统的总结和研究，为党和政府提供决策咨询、理论支撑和道德辩护。

研究价值和意义：（1）理论价值。冷战时期，中、美、苏三国关系演变的历程表现出了一个突出特点，那就是，任何两国之间关系的变化均深受第三国因素的影响。中国之于美苏关系，苏联之于中美关系，美国之于中苏关系均有特定的作用。因而，对 1949—1989 年中苏关系史的研究，没有美国因素的考量是残缺的。本课题研究无论对中苏关系史，还是对冷战史、美国外交史都是大有裨益的。（2）现实意义。由于中、美、苏三国是冷战时期也是当今世界上的三个大国：一个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一个是最大的发达国家，一个是中国的邻国。冷战期间美国对中苏关系的演变有重要的外部影响，今后美国和俄罗斯仍将与中国密切相关。

基本观点：研究 1949—1989 年中苏关系史必须把美国因素纳入其中。中苏两国 20 世纪 50 年代的结盟友好，60—70 年代关系的恶化和武力对峙，80 年代末的关系正常化，都与美国密切相关。研究 1949—1989 年美国与中苏关系的演变，不仅有益于中苏关系史研究，更有益于冷战史研究，从而有益于 21 世纪中国外交战略的制定。时隔五年，本课题也是对博士论文的延伸研究，完善相关梳理和述评，在博士论文注重美国因素的基础上

进一步注重美国与中苏关系演变的立体研究，推进研究深度。

本课题研究以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理论为指导，整体思路框架如下图所示：



研究方法：一是归纳和演绎法。通过综合和归纳，掌握研究动态，把握学术前沿，理清中外学者的研究现状；通过演绎法，分析美国对中苏关系演变的影响。二是综合分析法。既分析美国对中苏关系的影响，又分析中苏关系对美国的影响。三是梳理与分析相结合的方法。本课题用此方法梳理中苏关系史的演变，研究美国与中苏关系演变的相互关系，进行科学的分析与评价。四是静态分析与动态分析相结合的方法。通过此法，对美国与中苏关系的演变有一个全景式的理解。对美国与中苏关系的演变分析时，既有对外交政策的静态分析，又有对外交战略和外交关系的动态分析。

创新之处：（1）研究视角和思路的创新。从一个立体的角度对中苏关系进行梳理，并分析美国与中苏关系的密切关联。（2）研究内容的创新。对 1949—1989 年中苏关系史进行阶段划分，这个目前尚没有定论，同时对冷战时期的中苏关系及美国外

交作整体的综合分析评价。(3) 研究方法体系上的创新。创新性地采用综合分析法、梳理与分析相结合的方法、静态分析与动态分析相结合的方法。方法上的创新保证了项目研究的前瞻性、科学性及可行性。

三 研究框架和要点

本课题研究拟分为五章：

第一章着眼于理论探源。探寻 1949—1989 年美国对中苏两国外交政策的历史文化渊源，为后面论述美国针对中苏关系的政策和战略作铺垫。1949—1989 年，美国实行了反苏反共的冷战外交政策。除了试图成为世界领袖的时代现实考虑之外，更主要的原因是美国所具有的政治文化传统，如使命观思想、扩张意识、种族主义等文化传统以及反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历史传统。首先，它的政治文化传统主要可以概括为四点：(1) 使命观思想。这包含美国例外论、天定命运观以及美国乐善好施的思想。这种“天赋使命”的理想主义观念将基督教普世主义信仰与现实世界相结合，以独特的文化传统指引着美国外交政策的大方向。(2) 扩张意识。扩张主义是“种族优越论”的必然产物。大多数美国人认为扩张不是一个贬义词，是实现“天赋使命”的重要手段。(3) 种族主义。在美国的历史中，鼓吹白皮肤的美国人（尤其是英国后裔）属于最精华的种族的盎格鲁—撒克逊主义十分流行。这种种族优越感强烈地影响着美国的国家政策，对外它们特别强调担负领导和保卫各自由国家的责任。(4) 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交错存在，作为既对立又统一的两极共同影响着美国的冷战政策。理想主义对美国冷战政策的影响主要在于，它结合了美国政治文化中的使命观思想，使得美国的冷战政策具有了道义的色彩。而现实主义主

要强调实力尤其是军事力量在外交政策中的作用,强调维护美国的主权、安全和国家利益。其次,反共主义作为一种意识形态,成为1949—1989年美国推行反苏反共冷战政策的王牌。正是在反共主义的掩护下,美国高调展开与苏联的对抗并对新中国进行了长达20年的遏制和尖锐敌视。美国外交上的反共主义有着极为深刻的经济、政治和社会文化根源,既具有整个资本主义世界共性的因素,也有美国特有的因素。同时与社会主义国家的政策失误也有一定关系。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美国经济、军事等综合实力的迅速膨胀在客观上为美国推行它的外交政策、实现扩张梦想、体现文化特征创造了空前的历史机遇。由此便有了后来美国与中苏关系互相纠缠、互为因果的关系。

第二章对1949—1958年中苏结盟友好时期的美国因素进行分析。这十年间,美国凭借世界首强的综合实力,对中苏关系施加了全面、直接的干涉。这一期间,美国对中苏关系的影响是巨大的,甚至可以用“无处不在”来形容,因为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初期到1950年中苏新约的签署再到中苏“蜜月”友好,中苏关系的上空始终笼罩着美国这块阴云。美国的中苏战略以反苏反共为主,但同时又积极地试图分化中苏关系。这一时期美国分裂中苏关系的“楔子战略”的重点,由出台之初的阻止中国同苏联结盟调整为用“高压”遏制政策迫使中苏关系分裂。这一期间美国的中苏战略自相矛盾,目标并未实现,反而将自己与社会主义的中国和苏联隔离开来;中苏两国在亲密友好的大背景下,也潜伏着矛盾和危机,埋下了中苏关系走向分裂恶化的祸根。

第三章对1959—1978年中苏关系破裂过程中的美国因素进行梳理。这20年,中苏关系由意识形态分歧到关系破裂,直至逐渐恶化,甚至一度濒临战争边缘。中苏关系的这种巨大变化,

除了与两国关系中的种种“内因”有关之外，与美国这个“外因”也有莫大关系。这一时期，美国始终没有放弃使用分裂中苏关系的“楔子战略”，其分裂中苏关系的愿望最终得以实现。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作为影响中苏关系的重要因素，美国在这一时期对中苏关系恶化分裂的反应比较迟钝，大部分时间仍然执行对华敌视和对苏有限缓和的政策。可以说，中苏关系真正走向破裂的过程受美国因素的客观影响很大，但美国主观上并未积极施加影响。换句话说，美国引起、促成了中苏分裂，却又没有积极利用中苏分裂的现实调整其对苏对华政策。这一时期，美国对中苏关系的认识基本准确，也就是说它认识到了中苏关系的恶化分裂，但是它的外交战略中冷战思维过于浓重，其中苏关系战略及对苏对华政策太过僵硬。尤其在 20 世纪 60 年代，美国夸大了“中国威胁论”，而宁愿与苏实行有限缓和，甚至愿意与苏联联合，共同遏制中国，唯独不肯放松其对中国的极端敌视政策。正是由于美国因素的存在，才形成了美苏相对缓和与中美尖锐对峙的局势，这种局势对共同抗美的中苏同盟构成了严重的冲击，直至同盟的最终破裂。同样，由于美国因素的存在，中苏关系持续紧张，但又避免了战争对抗。

第四章考察了 1979—1989 年中苏关系正常化进程中的美国因素。其中包含卡特政府末期和里根政府的中苏政策。这 10 年，美国的中苏政策的主要特点是趋向强硬。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同 30 年前很相似，美国的对苏对华政策再次使中苏两国化敌为友、握手言和，并且正常化的实现使两国关系从此走向真正的成熟。本章以美国的外交政策和中苏关系的演变为基点，梳理和分析中苏关系正常化进程中的美国因素。1979—1981 年，美国的对华对苏政策由于台湾问题及苏美竞争的加剧而再次调整，它的外交政策中突出了反苏反共的冷战思维，致使中美关系出现波折，美

苏关系趋向紧张。美国政府的这种政策,使中苏两国又几乎同时感到了缓和中苏关系的战略需要。这一期间的中苏关系虽无改善,但已是黎明前最后的黑暗。1981—1989年,里根政府实行“新现实主义”外交政策。在美国政策的影响下,中苏两国在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作出了改善关系的战略调整,顺利完成了关系正常化进程。

第五章结语部分从美国因素的轨迹、效果、特点等方面对1949—1989年中苏关系中的美国因素进行综合分析。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夕,基于阻止中苏结盟的目的,美国出台了“楔子战略”以阻止中国倒向苏联。然而新中国成立后新的中苏同盟的确立和朝鲜战争爆发后中苏友谊的巩固以及中美两国在朝鲜战场上武力对抗局面的形成使美国分裂中苏关系的外交战略遭遇重大挫折。50年代初,即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对分裂中苏关系的“楔子战略”进行了第一次调整,其战略重点由出台之初的企图“拉”中国脱离苏联调整为“压”中国脱离苏联,美国的遏制政策由针对苏联一国变为针对中苏两国,它的对华政策的基本内容也相应变为孤立、封锁和包围。1958年前后,基于对中苏两国不同的认识,美国对分裂中苏关系的“楔子战略”进行了第二次调整,它在继续保持对中国的高压遏制政策的同时开始对苏联实施有限缓和政策;到60年代中后期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美苏联合对付中国的局面。美国这种“一压一和”的中苏战略持续了十几年,直至1978年底中美关系实现正常化才告一段落。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中苏两国因为对美战略的分歧而分道扬镳直至武力对峙,但美国并未因为美苏冷战的大格局或中苏关系分裂恶化的现实而改变其对中苏两国的政策,相反它仍一味坚持敌视中国的政策。因此可以说,中苏关系从分歧走向破裂的过程中美国因素客观上起了重要作用,但主观上美国的反应是迟

钝的，甚至是与其美苏冷战对抗的全球战略相矛盾的。1979—1989年10年间，由于美国的对苏对华政策的进一步调整、中美关系正常化的实现、中国政局的变动以及美苏冷战的加剧等因素的影响，中苏两国的关系在对抗中逐渐酝酿转向并最终在1989年实现了正常化。

概而言之，1949—1989年中苏关系中的美国因素具有以下特点：

其一，这40年中美国对中苏两国的政策是服从于美国的冷战全球战略的，以冷战思想为指导。在两极格局下，美国的对华政策更多服从于其对苏政策，中国不过是其冷战全球战略大棋局中的一颗重要棋子。无论是“拉”中国脱离苏联、“压”中国与苏联分裂还是“拉”苏联“压”中国，美国的战略目的都是削弱社会主义阵营的力量，都是为其全球战略服务的。尽管纵向地看，美国的中苏政策和战略在60年代末以后是渐趋理性的，外交政策中的意识形态色彩逐渐淡化，国家现实利益的考虑逐渐占据中心。但整体来说，这四五十年的美国对苏对华政策充满了浓厚的反苏反共的意识形态特征。

其二，这40年中美国对中苏两国的政策始终以美国的国家利益为基础。对国家利益的追求是美国对外政策的基础，这一时期美国的中苏政策也不例外。所谓“国家利益”指的是“一切满足民族国家全体人民物质与精神需要的东西”^①，即物质上的安全与发展，精神上得到国际社会尊重与承认。国家利益主要由政治利益、安全利益、经济利益和文化利益构成。冷战时期的中美苏关系中美国考虑的主要国家利益是政治和军事安全利益，60年代末以后随着三国三角综合运作的形成及全球化时代的到来，

^① 阎学通：《中国国家利益分析》，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0页。

经济利益在美国的国家利益中迅速凸显。因此，便有了中国战略重要性的相对提升和两极格局的逐渐瓦解。

其三，这一时期中苏关系中的美国因素具有动态特征。受国际国内诸多因素的影响，这一时期美国的对苏对华政策及其中苏战略几经调整。除了意识形态和国家利益的考虑，这一时期美国的对苏对华政策及其中苏战略的制定还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其中既包括美国的全球战略、美苏关系、美中关系等国际因素的影响，也包括政府组织机制、官僚政治等国内因素影响，同时经济因素在 70 年代以后逐渐成为影响美国对苏尤其是对华政策的非常重要的因素。

总体而言，一方面，1949—1989 年美国达到了它要分化中苏关系的战略目的，在诸种美国因素的影响下，中苏关系由友好同盟逐渐走向了分裂恶化。从这个角度看，美国因素在中苏关系的发展演变过程中起了重要作用，中苏两国对美国的政策非常重视。另一方面，考察 1949—1989 年中苏关系中的美国因素，又不能说它是完美的，因为整个冷战时期的美国外交政策中反苏反共的意识形态色彩非常浓厚，五六十年代美国的对华政策尤其尖锐和敌对。

第一章

美国对中苏外交政策的历史文化渊源

美国自由派历史学家小阿瑟·施莱辛格说过：“对外政策是一个国家向世界展示的面孔。所有国家的目标都是一致的，即保护国家的完整和利益。但是一个国家设计和执行本国外交政策的方式，受到国家特性的巨大影响。”^① 他所说的美国对外政策中的国家特性，就是美国的历史文化渊源。

历史文化传统对美国外交政策的影响是多方面的，不仅在确定政策的目标中起着重要作用，而且对执行政策的手段、方式和风格有着巨大影响。历史文化底蕴为美国实行冷战外交政策提供了深厚的土壤和基础，冷战外交政策是美国所具有的独特的文化特性的一种表达和再现。

1949—1989年40年中，美国实行了反苏反共的冷战外交政策。其中除了试图遏制苏联、成为世界领袖的现实考虑之外，更主要的原因是美国所具有的历史文化传统，如使命观思想、扩张意识、种族主义等政治文化传统以及反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历史传统对当时国家外交政策的影响。

^① Arthur M. Schlesinger, Jr., *The Cycles of American History*, Boston, 1986, p. 52.

第一节 政治文化传统

1949—1989年美国的几届政府领袖受到美国政治文化思想的浸润，他们所制定的对中苏两国的外交政策必然带有明显的美国政治文化的独特烙印。美国的政治文化传统主要包含使命观思想、扩张意识、种族主义、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等几个方面。

一 使命观思想

在美国的历史中，始终贯穿着“救世主精神”和“自命不凡的使命感”。这种使命观思想包含美国例外论、天定命运观以及美国乐善好施等价值观。这种“天赋使命”的理想主义观念将基督教普世主义信仰与现实世界相结合，以独特的文化传统指引着冷战时期美国外交政策的大方向。

很多美国人认为，美国人是上帝的选民，美国是上帝选择一个特殊的国度，它对人类的历史发展和命运承担着特殊的责任，对外他们特别强调担负领导和保卫世界各自由国家的责任，向世界输出美国的自由民主价值观。

众所周知，美国是个移民组成的国家。早在殖民地时期，清教徒移民北美就是受到这种思想支配的。在早期移民的眼中，他们来到北美大陆这块“希望之乡”就是上帝的有意安排。“由于土地肥沃，资源丰富，气候宜人，北美似乎就像上帝隐藏起来的希望之乡，现在即将由上帝的选民所占据。在神的指导和保护下，他们将致力于把光明和拯救带给世界其他地区。”^① 随着美

^① Edward M. Burns, *The American Idea of Mission, Concepts of National Purpose and Destiny*,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1957, p. 30.